

《太平圣惠方》载方未注明出处的分析研究^{*}

章碧明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咸阳 712000)

〔摘要〕运用文献学研究方法,对《太平圣惠方》未注明所收方药出处的原因进行分析和研究探讨。通过考证:《御制太平圣惠方序》的阐释、北宋时期“煮散”的习俗以及那个阶段的处方用药特点等,从多角度对《圣惠方》选录方药不作出处注明进行探讨,不仅为《圣惠方》引用文献的考证研究做一个铺垫,也对研究中医方药发展演变规律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太平圣惠方;文献;研究

中图分类号:R2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2723(2011)05—0015—03

《太平圣惠方》(以下简称《圣惠方》)^[1]采用政府组织的力量编纂发行,这也是官刊方书利用政府之便,具有方剂采撷面广,方书有权威性,集同时代方剂之大成的特点,使前代医家的方剂得以流传后世,对保存医学文献作出了很大贡献,对医学事业的发展和医学知识的普及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圣惠方》的颁布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是北宋初年中国医药史上的一件大事。

《圣惠方》成书后“本书所收医论和医方,都未注明出处,实属美中不足。”^[2]这种状况对研究北宋以前有关医方书文献确实存在着诸多遗憾和困惑,面对其御制序中所得到的“……并遍于翰林医官院,各取到经手家传应效药方,合万余首。”这样一个丰富的医籍文献资源,而无法逐一确认,应该是中医药医史文献学研究上的一个空白。

中医药发展至北宋时期,已经初步具备了完整的理、法、方、药理论体系。这一点也可以从《圣惠方》作为一部官修综合性医方书所反映的情况得到证实,如其第一卷至第七卷从总论角度揭示出当时中医的基本理论的研究状况,含盖了脉法、脏腑病证的诊治、脏腑用药理论以及服药的基本知识等内容,做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总结。在第八卷以后以疾病的病证分类,均为临床各科疾病的诊治方药,将医药理论系统的结合在一起。因此通过研究《太平圣惠方》引用

文献,是研究北宋初年中医药发展状况,以及整个中医药发展史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填补长期以来中医药研究的一项空白。对《圣惠方》引用文献来源“辨彰学术、考镜源流”也是一个非常有实际意义的研究工作。

《圣惠方》引用文献的考证研究是一项涉及面广而复杂的工作,为了使研究具有条理性,故将《圣惠方》未注明所收方药出处的原因分析、有关引用文献在历史著作中的记载等问题的研究探讨共同讨论,为今后开展的研究做一个铺垫。

1 《御制太平圣惠方序》为其选录方药不作出处注明做了阐释

《御制太平圣惠方序》中提到其在选择药方时“……求妙删繁,备诸方册,讨寻精要,演说无所不周,论诂简编,探赜悉闻尽善,莫不考秘密,搜隐微……”,如《圣惠方》卷第2:论合和、论服饵、论用药是针对中药的煎服而设。论合和主要论述“汤”、“丸”、“药酒”、“膏药”等等制剂方法和应该注意的事项,强调了“是以医者,必须殷勤注意,再四留心”。针对古方用量指出“又古方药味,各以铢两,及用水皆言升数”,“何以明其取舍,今则加減合度,分两得中,削旧方之后参差,洽今时之后行用。”点明了《圣惠方》在收录古方时药物剂量应时变通的情况。在药物的选取上“俾令修合煎调”,

* 收稿日期:2011—04—03 修回日期:2011—07—10

作者简介:章碧明(1965~),男,浙江绍兴人,主治医师,主要从事中医临床工作,研究方向为中医方剂在临床运用中的效果与评价。

“凡草有根茎枝叶，皮骨花实，诸虫有毛翅皮甲头足尾骨之属，有须烧炮炙，热熟有定，一如其法”。再有，论服饵中就药物的服法做了详细的论述，指出“夫药有君臣佐使，人有虚实，服饵之法，轻重不同。少长殊同，强羸各异，或宜补宜泻，或可汤可丸，加減不失其宜。”对服药的方法，诸如食前服、食后服、温服、冷服、顿服、频服等等，以及服药后应该注意的事项都做了详细的说明。

由以上可以说明，《圣惠方》收录方药时均根据实际效用情况做了修改或者补充。这些修改或者补充的情况是在所录的原方基础上进行，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其原有的面貌，所以也是其未注明方药出处的原因之一。

2 “煮散”是其可能的原因之一

“煮散”首先见于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以下亦简称《千金方》）的记载，其在卷八有续命煮散、独活煮散；卷十一有防风煮散；卷十二茯神煮散等，煮散的出现也是与药物资源的充分利用有关。据现有史料的考证，中医煮散出现也是在社会环境发生动荡变化情况下为有效地利用药物资源有关。如史料记载，天宝十四年（公元 755 年）安史之后乱，其后出现战乱频繁，交通不便，药材的运输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庞安时在《伤寒总病论》中记述到：“唐自安史之后乱，藩镇跋扈，至于五代，天下兵戈，道余艰难，四方草石，鲜有交通。故医家省药，以汤为煮散。”^[3]

北宋统一全国以后，应用煮散的习俗并没有停止，这也是和当时药物资源的有限有着密切的关系。犹如庞安时所言：“近世之人，嗜欲益深；天行灾多，用药极费。日月愈促，地脉愈薄。产药至少……”^[3]因此煮散在北宋依然被医家广泛地使用。随着北宋时期社会经济生活的繁荣昌盛，人口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很多，势必对药物的需求量也有所增大，从节约药物资源的角度出发，使有限的药物资源能够得到充分的利用，对北宋政府而言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可以推断在当时推广并应用中药煮散治疗疾病是中医药界的一个共识。《圣惠方》作为一部官修的具有重要历史使命的综合性医方书，其大量采用药物煮散的剂型也就可想而知了。这一点在《圣惠方》所收录的 16834 首方药中也能得到证实，其收录的处方中，除一些特别剂型外，大多数均为煮散服药形式。

收录医方时“无非亲验，并有准绳，贵在救民，去除疾苦”的标准，同时又在收录的方药中采用了大量的“煮散”形式，所以在药物炮制、药物剂量方面的改变也在所难免。在原方治疗病证不变或者变化

不大的基础上，其药物炮制、剂量等方面发生了变化，有的甚至需要增加药味以取得更好的疗效。如《圣惠方》第三十六卷治舌肿强诸方中，“治腹中虚热，舌木强直，口吻两边痛，舌上有疮，咽食不得，宜服柴胡散方（柴胡、川升麻、梔子仁、赤芍药、木通、黄芩、大青、杏仁、石膏）……捣筛为散，每服五钱，以水一大盏，入生姜半分，煎至五分，每干食后温服。”比较《千金方》卷第六·七窍病舌病第四方十一首中“舌上疮不得食，舌本强，颈两边痛，此因心虚热所致，疗之方……右十味，切以水一斗，煎取三升半，分四服，日三夜一”，药物组成完全相同，但是《圣惠方》使用煮散剂型，而《千金方》使用汤剂。二者在药物剂量方面明显不同，《千金方》一次剂量的使用如：柴胡、升麻、芍药、梔子仁等均为一两半，《圣惠方》的标注剂量虽然是二两，但是分多次服用，每次的剂量总和仅五钱。可见药物的利用率明显提高；又《圣惠方》第三十七卷治小便出血诸方中“治因虚损，小便出血，柏味散方，柏叶、黄芩、桂心、阿胶捣碎炒令黄燥各一两，甘草、熟干地黄以上各一两……捣筛为散，每服五钱，以水二大盏，煎至五分，去滓，温温频服”，比较《千金方》卷第二十一消渴淋闭尿血水肿中尿血第三“治小便血方，生地黄八两，柏叶一把，黄芩，阿胶各二两，……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纳胶，分三服”，因煎服方式不同，《圣惠方》中多桂心、甘草，剂量也明显减少。

《圣惠方》在收录方药时，对由于各种情况而出现药物组成等方面的变化，与收录的原文有了区别，就不能再认为是原文，因此未注明其出处。

3 处方用药和药物煎服方式的变化以及改进也是未注明出处的原因之一

3.1 处方用药

处方用药是疾病治疗非常重要的内容，《圣惠方》卷二论处方法，对处方的方法进行了细致的论述，处方的前提是“当先诊知病源，察其盈虚，而行补泻”，其用药在于“辨土地寒暑，观男女盛衰，深明草石甘辛，细委君臣冷热”，识别疾病“或正经自病，或外邪所伤，或在阴在阳，或在表在里，当须审形候各异，虚实不同，寻彼邪由，知病所起”。处方时应该遵循“表实泻表，里实泻里；在阳治阳，在阴治阴”，传达了“故为医者，必须澄心用意，穷幽造微。审疾状之浅深，明药性之急缓，制方有据，与病相符”的处方用药思想。在“凡疗诸病，当先以汤

……能逐风冷，破积聚，消诸坚癥”中，阐述了制方时“汤”、“散”、“丸”等剂型的效用，并且从“医者意也”出发，明确了“大抵养命之药则多君，养性之药则多臣，疗病之药则多使”独特的“君、臣、佐、使”配伍用药理念，为我们理解《圣惠方》中所载录的方药提供了帮助。由此判断其收录的方药以方便实用取得疗效为宗旨，均做了不同程度的修改。

《圣惠方》卷二论处方法明显是沿用了《千金方》卷一论处方第五的思想和内容，其中“夫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临事制宜，当识斯要”的内容，两者基本吻合。可以推断《圣惠方》的论述是在《千金方》基础上的进一步提升，并且将“汤”、“散”、“丸”等剂型效用和“君、臣、佐、使”的配伍方法引入处方用药之中，使临处方进一步细化，也可以看出其对用药的认识和治疗疾病的水平逐步提高。

3. 2 煎服方法

在药物煎服方面，中药治病不但要对症下药，服药方法也要恰当，才能够取得良好的疗效。《圣惠方》卷二中，论合和、论服饵、论用药是针对中药的煎服而设。论合和主要论述“汤”、“丸”、“药酒”、“膏药”等等制剂方法和应该注意的事项，强调了“是以医者，必须殷勤注意，再四留心”。在对古方用量方面指出“又古方药味，各以铢两，及用水皆言升数”，“何以明其取舍，今则加减合度，分两得中，削旧方之参差，洽今时之行用。”点明了《圣惠方》在收录古方时，药物剂量的变化情况。在药物的选取上“俾令修合煎调”，“凡草有根茎枝叶，皮骨花实，诸虫有毛翅皮甲头足尾骨之属，有须烧炮炙，热熟有定，一如其法”。论服饵中就药物的服法做了详细的论述，指出“夫药有君臣佐使，人有虚实，服饵之法，轻重不同。少长殊同，强羸各异，或宜补宜泻，或可汤可丸，加减不失其宜。”对服药的方法，诸如食前服、食后服、温服、冷服、顿服、频服等等，以及服药后应该注意的事项都做了详细的说明。由此可

以推断，药物煎服方法的改进也是《圣惠方》修改了收录方药原因，因此而不注出处。

3. 3 药物选取

《圣惠方》卷第二论用药中，列举了临床选用药物时的规则“人居五行四气，病生暑湿风寒，药分三品七情，性有温平冷热”，“庶欲立方，便须凭据，疗之合理，病无不痊”。对药物的“君臣佐使”配伍、“四气五味”，以及药物之间的“七情”亦做了比较详实的论述，指出临床用药“以相宜摄合和”、“阴阳配合”、“合和之时，用意视之，当用相须相使者良，勿用相恶相反者。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者，不而，勿合用也”。

4 讨论

通过以上方面的列举不难发现，《圣惠方》在药物使用较前人更为系统和全面，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改进和提高，形成其独特的处方用药方式。因此，也可以作为《圣惠方》在选录方剂时剂型、剂量发生变化的有力依据。

同时，作为一部由宋太宗亲自督办，朝廷组成编纂的综合性医方书，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如《中国医籍考》^[4]记载“……赐宰相李昉，参政黄中沆，枢臣仲舒准，五月己亥颁天下，诸州置医博士掌之”，为了维护这种权威性，统一当时民间流传的各种治病用药方法，所以在对各种收录方药进行整理研究以后而编纂成书的《太平圣惠方》也就将各种方药的出处不作专门的注明。

[参考文献]

[1] 宋·王怀隐. 太平圣惠方（上下册）[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

[2] 王应秋. 中国医籍提要 [M]. 吉林：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149.

[3] 庞安时. 伤寒总病论 [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9：158.

[4] 日·丹波元胤. 中国医籍考 [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562.

（编辑：岳胜难）

Prescription of TCM in *Tai Ping Seng Hui Fang* not Indicate the Origin of the Cause of the Research

ZHANG Bi – ming

(Shanxi Polytechic Institute of Health Administration Center, Xianyang Shanxi 712000,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to use the method of bibliography, For *Tai ping seng hui fang* not indicate the origin of the cause of the research. Use reference work, from several aspects of research and analysis, judge why does it not indicate the sources, the study is not only do a good bedding for the stud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change the laws is also significant.

[KEY WORDS] *tai ping seng hui fang*; bibliography research